

高等教育是适度发展,还是大力发展

Great Efforts to Develop Higher Education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北京 100086)

兰士斌

(光大资产评估公司市场信息部)

内容提要 本文建议调整高等教育政策,即由适度发展转变为大力发展。因为我国将在今后约15年左右的时间,由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标来看,下中等收入国家受过高等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低收入国家有极为显著的提高,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或每10万人口中的大学在校生数大幅度上升。本文建议:用15年左右的时间,即到2010年或稍后,将我国受过高等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目前的2%提高到8~9%,与此相应,建议分3步走,力争在2010年或稍后,使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达到乃至超过下中等收入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亦即约2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口径)的平均水平。

高等教育是适度发展,还是大力发展,在我国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一种流行的、至今仍然颇有影响的观点是:对应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有的高教规模已经过大,明智的选择是控制数量、注重质量、优化结构^[1]。国家教委近10年来反复重申并实际执行的就是名为适度发展、实为控制发展的方针。近两年来,由于社会各方面日益高涨的呼吁,国家教委的政策有所微调,但仍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2]。

我们认为,围绕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与规模问题开展讨论,制定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既要有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和正确的研究分析问题的方法,又要有发展的眼光和战略性的远见,尤其要对我国的经济水平、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趋势以及高等教育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经济学角色做出正确的估价和科学的判断。我们的建议是: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大力发展;与此相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调整。

毫无疑问,教育,尤其是当今时代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正因为如此,首先需要恰如其分地估价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确地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

1. 从经济发展指标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介于低收入国家和下中等收入国家之间,正处于由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过渡期。

众所周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通用指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简称人均GNP),它是按人口平均的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与劳务总价值的货币量度。世界银行以往发表的世界发展年度报告只公布按汇率计算的各国家和地区人均GNP的美元值(汇率值)。鉴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的产品和劳务只是这些国家生产的最终产品与劳务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一部分,因而汇率值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事实上存在着严重的低估,近几年来,世界银行报告除了公布汇率值,还公布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测算的人均GNP修正值(PPP值);同时又指出,购买力平价方法忽略了一些项目尤其是服务业在经济价值上的差异,可能又高估了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水平。

显然,汇率值是人均GNP的下限值,PPP值是上限值。这样,我们就不难通过数据对比与排序,对我国的经济水平做出恰当的估价:

第一,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5年)及其分类办法(见表1),可知凡是人均GNP汇率值在765美元以下的,属于低收入国家,凡是人均GNP汇率值在765~3035美元之间的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我国人均GNP汇率值为620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同年我国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测算的PPP值为2920美元。这就是说我国的人均GNP在620~2920美元之间。

第二,世界银行也给出了同年其它133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NP的PPP值。如果将PPP值与汇率值的比值定义为人均GNP修正系数,用算术平均法计算,高收入国家为0.9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9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49,低收入国家为3.98,我国为4.71。

第三,若按人均GNP由低到高排序,在既有汇率值又有PPP值的47个低收入国家中,若按汇率值排列,我国的顺序是第41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测算的PPP值排序,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排序都有所变化,如印度(汇率值340美元,PPP值1400美元,修正系数4.12),从第26位升至第27位。但除个别国家外,原有的即世界银行按汇率值对各国家和地区的归类基本没有改变。我国是仅有的几个位次变化较大的国家之一,由第41位升至第55位,与之相邻的基本上都是下中等收入国家中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本文表格中称下中等A类国家)。

据此,可以确切地说,我国目前的人均GNP水平介于低收入国家和下中等收入国家之间,也就是说,我国正处于经济水平由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过渡期。

2. 从高等教育发展指标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我们建议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大力发展,其基本依据之一在于: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这里需要指出,不少研究者在进行或简或详的国际比较时,只考察了毛入学率(在校大学生在适龄人口^[3]中所占的比例)或者每10万人口的在校大学生数这两个指标。然而,这两个指标并不足以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间的真实关系,因为这类指标反映的只是正在培养的在校大学生,是“增量”意义的指标。要全面反映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还需要考察“存量”意义的指标,即考察受过高等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而且要以此为基础来讨论有关“增

表1 世界银行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及各类中的主要国家和地区(1995年数据)

单位:美元

分 类	人均 GNP (汇率值)	人均 GNP(汇率 值)平均值	本文简称	主要国家和地区及总数
低收入国家	765 及以下	430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越南、埃塞俄比亚、 缅甸、坦桑尼亚、肯尼亚、阿富汗、尼泊尔、加纳、莫桑比克、 也门、马达加斯加、乍得等 61 个
下中等收入国家	766~3 035	1 670		
人均 GNP≤1 700	766~1 700		下中等 A 类国家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 27 个
人均 GNP>1 700	1 701~3 035		下中等 B 类国家	伊朗、土耳其、泰国、哥伦比亚、秘鲁、伊拉克等 24 个
上中等收入国家	3 036~9 385	4 260		巴西、墨西哥、南非、阿根廷、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希腊、 匈牙利等 24 个
高收入国家	9 386 及以上	24 930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韩国、西班牙、加拿 大、荷兰等 34 个
中国	—	620	—	—

注:表中数据均系 1995 年数据,主要国家和地区按人口数排名;低收入国家平均值包括了我国,若不包括中国(因是国际比较,以下表格低收入国家平均值均不包括中国),我们同样按年中人口加权平均计算,数值为 313 美元;下中等 A 类及下中等 B 类国家系由我们进一步细分;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表 1 及表 1a。

表2 各类国家 25 岁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比例的平均值(%) (90 年代初)

类 别	样本数	平均值	主要国家和地区数据
低收入国家	15	2.7	巴基斯坦 2.5(1990)、越南 2.6(1989)、塞浦路斯 17.0(1992)
下中等收入国家	25	8.8	
下中等 A	11	7.0	印度尼西亚 2.3(1990)、埃及 4.6(1987)、菲律宾 18.7(1993)
下中等 B	14	10.6	泰国 5.1(1990)、委内瑞拉 11.8(1990)、秘鲁 20.4(1993)、巴拿马 13.2(1990)
上中等收入国家	9	9.9	墨西哥 9.2(1990)、阿根廷 12.0(1991)、智利 12.3%(1992)、匈牙利(1990)10.1%
高收入国家	27	27.6	美国 46.5(1994)、日本 20.7(1990)、韩国 21.1(1995)
中国	—	2.0	(1990)

注:(1)按 1995 年年中人口(世界银行《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表 1 及表 1a)加权平均;(2)这里必须郑重指出,除我国现有高等教育人口“存量”指标显著低于低收入国家的 2.7%以外,根据我们所能见到的毛入学率,亦即所谓“增量”指标的最新数据,巴基斯坦(1991)、印度尼西亚(1994)、泰国(1995)、日本(1994)、韩国(1995)、美国(199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UNESCO 口径)分别为 3.0%、11.1%、20.1%、40.3%、52.0%、81.1%。同期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指标既不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值,也低于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其它国家如日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不像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么低。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Statistic Yearbook(1997)》(INTERNET 网址: <http://www.unescostat.unesco.org/Yearbook/>)

量”的问题。这是因为:假如我们的“存量”不低,“增量”指标低一些也不是不可以的;而如果“存量”不高,家底本来就薄,“增量”指标如果也低,那就更需要大力发展了。

衡量受过高等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国际通用指标是 25 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的比例。根据我们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90 年代初受过高等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这一数据计算的结果(表 2),低收入国家的按人口加权的平均值为 2.7%,下中等收入国家为 8.8%。然而 1990 年的中国仅为 2.0%,既较低收入国家 1990 年的水平低 26%,也低于印度 1981 年 2.5%的水平。这

表明,即使与低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受过高等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也严重偏低,高等教育理应有比其它低收入国家更快的发展。

但是,无论用毛入学率还是用每 10 万人口中的在校学生数这两个衡量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指标来衡量^[4],我国也并不比低收入国家高。1994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6%)和每 10 万人口中的在校大学生数(440.4)才刚刚达到低收入国家 90 年代初(4.5%、417.7)(表 3、表 4)的水平。这就是说,在我们的一些论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超前发展”已是“事实”,主张控制乃至限制发展的时候,单从“增量”指标考察,我国达到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时间还比他们错后了 3~4

表3 1990~1996 年我国高等学校毛入学率和每 10 万人口的大学在校生人数

年 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在校生总计(万人)	382.22	360.78	375.73	450.52	527.85	562.19	583.91
研究生	9.31	8.81	9.42	10.68	12.79	14.54	16.23
普通高校本专科生	206.27	204.37	218.44	253.55	279.86	290.64	302.11
成人高校在校生	166.64	147.60	147.87	186.29	235.20	257.01	265.57
人口(万人)	114 333	115 823	117 171	118 517	119 850	121 121	122 389
每 10 万人口的在校生数	334.3	311.5	320.7	380.1	440.4	464.2	477.1
毛入学率(中国口径)	3.4%	3.5%	3.7%	4.7%	5.7%	6.5%	7.1%
毛入学率(UNESCO 口径)	2.7%	2.8%	3.0%	3.8%	4.6%	5.2%	5.7%

注:毛入学率(UNESCO 口径)是我们按 UNESCO 口径修正的毛入学率数值。之所以修正,是因为毛入学率(中国口径)是以 18~21 岁 4 年段而非 18~22 岁 5 年段人口数为分母计算的,与 UNESCO 口径不符(详见正文注^[3]与注^[4])。

资料来源:人口数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在校大学生数、毛入学率取自《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6)》。

表 4 各类国家毛入学率(%)和大学在校生占人口比例的平均值(90年代初)

类 别	样本数	毛入学率 (%)	每 10 万人口中的大学在校生数
低收入国家	52	4.5	417.7
下中等收入国家	49	22.4	1 946.0
下中等 A	27	18.3	1 672.9
下中等 B	22	27.1	2 257.8
上中等收入国家	18	15.8	1 446.1
高收入国家	30	53.0	3 901.2

注:按 1995 年年中人口(世界银行《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表 1 及表 1a)加权平均。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Statistic Yearbook(1995)》。

年,何况我们的“存量”本来就不比人家高!

尤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正在由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国家过渡,那么从“存量”指标来看,我国受过高等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 2.0%还不到下中等收入国家的 1/4;从“增量”指标来看,即使以中国 1996 年数据计算,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78%也只相当于下中等收入国家 90 年代初平均水平的 1/4!

3. 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演进的趋势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客观上必须有比以往更为迅速的发展。

我们建议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大力发展,其基本依据之二在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由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国家过渡,产业结构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必将发生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客观上要求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比以往有更为迅速的提高。

如上所述,下中等收入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每 10 万人口中的在校大学生数都是低收入国家的近 5 倍(见表 4),这绝不是偶然的。前已述及,下中等收入国家受过高等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8.8%)是低收入国家(2.7%)的 3 倍(见表 2);此外,统计分析表明(见表 5),随着经济水平由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国家过渡,从业人员中,农业生产人员将显著减少,亦即从 42.5%下降到仅为 30.1%(高收入国家甚至下降到只有 5.6%),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所占比例迅速提高,亦即分别由 5.5%、1.2%上升至 11.2%、2.4%,下中等收入国家要比低收入国家翻一番。这表明,在由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一个显著而深刻的变化是,社会对高素质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数量客观上存在着急剧扩大的需求。注意到这种内在需求扩大提高的幅度,更意味着如此显著而深刻的变化是一个质的突变,其根源在于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巨大变迁,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等闲视之!

将我国的产业结构、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进行比较(表 6、表 7),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以及从业人员的产业构成已经开始向下中等收入国家过渡。

表 5 各类国家从业人员的职业构成的平均值(%) (1994 年左右)

类 别	样本数	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办事员	销售、服务人员	农业生产人员	生产、运输、建筑工人
低收入国家	5	5.5	1.2	5.2	15.4	42.8	29.1
下中等收入国家	25	11.2	2.4	6.5	18.1	30.1	31.7
下中等 A	13	11.3	1.4	6.0	16.2	29.8	35.4
下中等 B	12	11.0	3.0	6.7	19.0	30.4	29.5
上中等收入国家	13	9.7	6.7	10.8	24.7	22.6	25.3
高收入国家	27	17.5	9.0	15.1	23.0	5.6	28.9

注:按 1995 年年中人口(世界银行《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表 1 及表 1a)加权平均;由于是加权平均,各类国家职业构成之和不能归一到 100%;管理人员指高级行政人员和公司经理。

资料来源:各国家和地区从业人员的职业构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Statistic Yearbook (1996)》按国际职业分类标准划分并给出的分职业从业人员数计算。

表 6 各类国家三次产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构成的平均值(%) (1995 年)

类 别	样本数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制造业)	第三产业
低收入国家	46	30.0	27.7	16.5	41.7
下中等收入国家	38	12.7	36.3	24.2	51.0
下中等 A	20	18.2	36.4	22.09	45.6
下中等 B	18	9.5	36.1	25.4	54.1
上中等收入国家	13	10.8	33.9	21.8	55.2
高收入国家	17	2.3	31.0	20.5	66.7
中国	—	21	48	38	31
中国(1995 年)*	—	20.5	48.8		30.7
中国(1996 年)*	—	20.2	49.0		30.8
中国(1997 年)*	—	18.3	49.2		32.5

注:按 GDP 加权平均;因是加权平均,各类国家三次产业构成之和不能归一到 10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表 12;标 * 号的数据取自 1995 年和 1996 年见《中国统计年鉴(1997)》,1997 年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 199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人民日报等,1998 年 3 月 5 日)

显然,无论从从业人员的产业构成还是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来看,我国工业的比重已经不低,即使不排除其比重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有上升的可能,

但已经接近极限。可以预期,随着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短期相对稳定、中长期可能趋于下降,第三产业将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充当第一产业比

重下降补充者的角色,而是在补充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的同时,逐渐并日益扩大,成为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起主导作用的领衔主角。

表 7 各类国家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构成的平均值(%) (1994 年左右)

类 别	样本数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低收入国家	6	56.5	15.0	28.2
下中等收入国家	28	34.5	23.1	41.6
下中等 A	15	41.6	18.6	38.5
下中等 B	13	26.7	28.1	44.9
上中等收入国家	14	23.5	23.5	53.1
高收入国家	29	6.5	28.8	64.6
中国(1993 年)	—	56.4	22.4	21.2
中国(1994 年)	—	54.3	22.7	23.0
中国(1995 年)	—52.2	23.0	24.8	24.8
中国(1996 年)	—	50.5	23.5	26.0

注:按 1995 年年中人口(世界银行《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表 1 及表 1a)加权平均;因是加权平均,各类国家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构成之和不能归一到 100%。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其它各国家和地区从业人员的三次产业构成数据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Statistic Yearbook(1996)》按国际行业分类标准划分并给出的分行业从业人员数,按《中国统计年鉴》对三次产业划分的口径计算。

这就是我国今后产业结构调整 and 演进不可逆转的方向。可以预期,这一不可逆转的方向引致的一个必然结论就是:今后我国的劳动力将更多地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一产业将更多采用新技术并解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第二产业劳动力状况的演变将以高文化素质劳动力比重的迅速提高为特征;第三产业也将逐渐增加智力密集型经济和高素质劳动力的比重。高等教育如果不能主动地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演进的这一方向,如果不能面对经济的集约化发展尤其是高科技农业、技术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和智力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对日益增长的大批专门人才的内在需求,我们就要犯全局性、战略性、历史性的错误!

4. 从经济运行的过程即投入与产出的循环来看,加大高等教育发展的力度,既可以扩大对相关第二、三产业产品的有效需求,又能够有力地带动包括新闻出版业、信息产业等在内的智力密集型第三产业或称为知识经济产业的增长。

我们建议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大力发展,其基本依据之三在于:从促进经济运行过程的良性循环的观点来看,加大高等教育发展的力度,既可以扩大对教学、科研设备、设施等建筑物及产品的需求,更能够创造对包括新闻出版业、信息产业等在内的智力密集型第三产业产品与劳务的有效需求,从而有力地带动知识经济产业的增长。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是:我国已经由过去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经济,转变为消费不足的买方市场经济。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这是我国经济生活的一大转变。目前这一全局性的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趋势还在不断增强。近来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不少产业、产品的出口需求受到抑制,国内需求亟待启动。这一经济形势的转变客观上要求在经济对策上不仅要进一步发展生产、保证供给,而且还要采取种种措施,鼓励消费,扩大需求。

从经济运行的过程即投入与产出的循环来看,加大高等教育发展的力度,不仅本身就是加快发展技术、智力密集型产业,促进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性措施之一,而且还是扩大需求、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需要看到的是,当前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一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二是具有较高教育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消费不足;而后的消费不足,更将严重地

制约着各种知识经济产业的发展。

前一时期,本文作者之一曾到某些县市进行科研经费和教育经费投入问题的调查。调查中发现的特点之一是,越是落后的地区,其教育经费的投入占当地 GDP 的比重往往能达到国家规定的 4%,甚而达到 5%,而越是发达的地区,却不仅达不到 4%,甚而只有 2%,如北京即是 2%,上海也仅为 2.2%!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越是发达国家,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就越高,可达 6%以上,而较为落后的地区却比较小,但也在 4%左右。为什么我国却出现反常现象?当然,这里也有对科技、教育重要作用的认识问题,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里有现实的经济问题。当物质产品供给不足时,优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物质产品供给不足。但在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要充分看到,随着物质产品的短缺状况不复存在,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必然要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这正是下中等收入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比低收入国家有极为显著提高的重要基础。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将高等教育作为扩大需求的消费热点,正是促进经济良性循环,进一步健康、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对高等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和作用,我们要有新的经济学思维。高等教育绝不仅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且还是扩大有效需求、改变消费不足的有力手段。与农田水利、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和住宅产业等经济增长点的关联效应显著不同,高等教育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一个典型而突出的特征是:它对经济的良性循环特别是知识经济产业的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正因为如此,这里必须尖锐地指出:从本质上看,要不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就是要不要大力发展技术、智力密集型产业,要不要大力发展知识经济的问题!

5. 从居民储蓄及其动机和政府的财政资源来看,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不是没有经济基础。

需要澄清的是,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因而从原则上讲,其经费总体上就主要来自学生缴费和社会力量投资,也就是来自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当然,就国家办教育而言,中央和地方政府除了集中财力办好义务教育,还应办好一批免费的或半免费的高质量的高中和大学,以培养优秀人才,支持清寒子弟入学。我们建议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大力发展,其基本依据之四在于:从居民储蓄及其动机和政府的财政资源来看,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不是没有经济基础的。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迈开了由免费教育向缴费教育转化的决定性的第一步,而且广大人民群众“已能用平和的心态看待高校收费‘并轨’,已接受了非义务教育要花钱的观念”,尽管收费标准只占培养费(目前全国平均生均所需费用每年约 1 万元)的 20%~25%。随着条件的成熟,特别是随着政府、社会、个人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进一步确立和完善,这项改革还应尽快迈出第二步、第三步。只要学校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就应当按照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因学科专业制宜、因人制宜的原则,有先有后、有节有度地向培养费的 50%乃至向 100%过渡(对少数热门学科、专业,收费标准甚至可以高于生均培养费,以市场杠杆调节导向)。与此同时,努力完善包括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基金、特殊困难补助以及学杂费减免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学生资助体系,尤其是要注重解决好约占学生 15%~20%的贫困生特别是约占学生 5%的特困生的学习和生活问题。

应当看到,中国的老百姓有着强烈的支持教育发展的意愿。据国家统计局 1997 年 11 月对全国所有城市 6 250 万户非农业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大规模调查,我国城市居民户均金融资产 2.23 万元,其中,储蓄占 69.3%;企业债券和股票 14.9%;国债、国库券占 9.0%;储蓄性保险占 2.6%;其它金融资产 4.3%。此外,要特别指出,这次调查提供的居民投资方式和意向是:“储蓄”居第一位,而“储蓄”的目的,“子女教育”则居第一位,其次才是“日常开销”、“应付疾病及意外”、“防老”。

另据有关数据,1996 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 38520.8 亿元,已相当于 GDP(67 559.7 亿元)

的57%;1997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为46279.8亿元,已相当于GDP(74772亿元)的62%。据最近电视新闻(1998年4月初)报道,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高达5万亿元人民币!

有理由相信,在每户基本上只有1个子女的情况下,家长们将更关注,也更有能力投资于子女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因此,有节度地提高收费水平占培养费的比例,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从民情讲也是有经济基础的。

许多革命老同志,常常为自己未能受到高等教育而抱憾。他们曾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儿女长大了,到了该上大学的年龄,又不幸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一代人又被耽误了,让儿女上大学的梦想不能成真,只好又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可是现在高考竞争这么激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以致第三代新人能不能考上大学,就仍然是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将高考的独木桥尽可能铺得宽一些,让更多的孩子们在该读书的年龄多读几年书,满足广大干部和群众合情合理、并不过分的要求呢?!

香港科技大学学术副校长孔宪铎教授曾经精辟地指出:“就政府而言,各级政府都在宣示教育的重要,但政府和家庭之间在观念上确有一个基本的差别,这就是父母和‘父母官’对教育的看法不同,感受不同。父母把对子女的教育看作投资,而‘父母官’则看成消费;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是希望下一代有收益,‘父母官’对任何投资都着重在下一年的收益。一般父母都会体验到和感受到子女从教育中得到的收益,而这种收益往往是不能以金钱来衡量的,一般‘父母官’却都不会在在现时看到和感受到在教育花费上所得到的收益和效果。由于上述多种不同的感受和心态,造成了为父母者和为‘父母官’者对教育的不同看法,从而形成双重标准。这就需要远见卓识的政府,把教育视为人才投资,一代见效;不应视为商品投资,一年见利”^[5]。

当然,由于政府、社会、个人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进一步确立和完善需要有一个过程,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在此之前,短期内完全可能需要有一定增量的财政性投入,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问题在于,近几年政府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连年下滑(1996年仅为2.47%)。因此,《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已明确规定的到本世纪末公共教育经费支出达到GDP4%的目标能否不折不扣地落实,这才是真正的关键!这里有必要再一次指出:政府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并非没有希望,因为我国公布的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10.97%(1996年数据),指的是预算内的收入,此外还有预算外的、制度外的、小金库的,还有各种摊派收入。据一些专家估计,政府实际上的财政性总收入达到GDP的33%~34%,也就是说各级政府控制的财政性总收入约占GDP的1/3。只要规定将这些收入划出一个相应的百分比用于教育经费支出,就可以使政府财政性教育支出达到GDP的4%。其它经济水平相同或相近的国家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就不能解决?!

6. 从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来看,现实的普通高等教育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不是没有现实潜力。

这里,我们要着重申明:我们建议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但并不主张,尤其反对大规模地兴建新校甚至再搞什么“大而全”、“小而全”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我们建议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大力发展,其基本依据之五在于:从我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普通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来看,现有的普通高等教育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不是没有现实潜力的。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师比(在校学生人数与教师人数之比)明显低于其它国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据一些学者研究(见表8),我国的这一比例只是其它国家的1/3~1/5,扩大招生规模不是没有潜力可挖。

目前除了普通高校现有师资力量的教学能力还远没有全部发挥,高校的实验室和其他教学等设施也都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只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校既包教学,又包学生的吃、住及其他后勤服务的

旧体制”,使高校主要管教学,而将学生的吃、住以及其他后勤服务转归社会,高校的在校生规模就会快速增长。尤其是现在有万名以上学生的重点大学,将会很快使其在校生人数增加1~3倍。在当前的现实体制状况下,我们主张,首先立足于挖掘现有潜力;没有宿舍,可以招走读生;设备不够,可以和设备相对充足而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学校联合招生;如果学校还不足,可以考虑将少数教学水平高、设备基础好的中专在充实师资、设备、建筑物等办学条件的前提下,升格为大专。

表8 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生师比的国际比较

	中国	美国	日本	印度*	印尼	巴西	韩国	泰国*
大学教师人数(万人)	39.1	82.4	27.1	32.0	7.6	13.3	7.7	5.2
在校大学生人数(万人)	204.4	436.2	288.7	480.6	175.8	156.5	176.2	95.2
大学生与教师之比	5.23	17.43	10.65	15.2	23.13	12.04	22.88	18.31

注: * 表示采用1990年的数据,其它采用的是1991年数据,中国1993年生师比为6.5。

资料来源:肖广岭,“从我国教育的战略格局看,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应取市场导向”,《科技导报》1996年第5期第22页。

此外,还要特别指出,为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选拔一批具有较高思想、业务素质,富于管理和实践经验的国家公务员充实到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人力资源,既有利于提高高等学校管理与教学水平,也有利于实现3年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分流50%的目标。这对我国当前正在着手大力推进的政府机构改革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一句话,只要我们本着开源与节流并重的原则,一些实际的问题或者所谓“困难”都不是高等教育大力发展的阻力。真正的阻力还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孔宪铎先生所说的“把教育视为人才投资,一代见效;不应视为商品投资,一年见利”的眼光。“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7. 澄清“控制发展”论者几个似是而非的论点

我们注意到,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与规模究竟是超前还是滞后的讨论,持两种相反观点的人在立论的依据、研究的方法、提出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以及对相关问题持有的价值判断上都不尽相同,因而形成的结论和看法迥异。这里需首先澄清“控制发展”论者几个貌似正确的主要论点。

(1)一些同志担心,高等教育发展快了,质量会受到影响。这种关切是好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质总是和一定的量相联系的。有了数量上的增长,就总会涌现出相应的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即使学生的平均质量有所下降,但只要涌现出的高质量的人才比控制发展时期的多,就不能认为是质量下降。发展是硬道理。即使是新增加的大学生质量较低,但受过高等教育总比未受过高等教育要好。当然,把握质量也是必须的,这就要求我们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入了学基本上100%都能毕业的做法,变“严进宽出”为“宽进严出”,使高等教育发挥培养和筛选两重功能。人才是在竞争中产生的,素质是在锻炼中提高的。在高等教育问题上,那种“包教、包学、包毕业、包分配”等已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做法必须改变。

(2)有的同志认为,专门人才的需求量有相当大的弹性,主张压缩对专门人才的需求,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改善人员待遇,以利于改变我国“脑体倒挂”这种十分反常的现象。然而这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从某一企业、某一学校来说,人才的需求确有相当的弹性,可以“得一士而安天下”;但是,就整体来说,人才的短缺问题就毫无弹性可言。因为人才的才能分布有一定的分布律,既要有高精尖的人才做为带头人,又需要有其它人才的配合与配套。事实上,我国在新旧体制并存这

一特殊历史时期曾严重存在脑体倒挂现象,至今也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但其根源绝不是因为专门人才多了,而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扭曲和压制了脑力劳动的报酬。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在专门人才比重高得多的发达国家却没有脑体倒挂。在我国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一些地区和包括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一些转制较为成功、较为彻底的国有企业在内的微观利益主体中,倒挂现象已经明显缓解甚至完全纠正。要在全社会根本扭转“脑体倒挂”现象,只能寄希望于加大经济体制改革攻坚的力度,寄希望于能真正体现价值规律的市场机制尽快起基础性、主导性的作用。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全面推进,随着教育投入的加大和国家对知识经济产业政策的扶持和加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已经为期不远,包括教师在内的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定会达到总体上较为合理的水准。

(3)有的论者认为,如果高校毕业生供过于求,就业不足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这种担忧可以理解,因为不只是大学生,任何劳动力群体失业率过高,可能的后果绝无二致。但有些论者在论及此时却说什么:大学毕业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不满要比上不了大学的不满“危险更大”,“要警惕盲目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出一批社会的反对者”,并声称“这绝非危言耸听”。这样的看法就大可商榷了。失业分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是任何国家经济生活中都不可避免的现象。从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年鉴(1996)》给出的约30个国家和地区按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失业状况数据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都有人失业,但其失业的比例比其他群体低得多。说轻一点,持上述论点,可能是没有搞清楚“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辩证关系;说重一点,这种说法不过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在90年代的翻版。为什么大学生越多,会培养出更多的“社会反对者”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根本上就有严重的问题。

(4)还有一些同志认为,“我国中小学毛入学率特别高,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在低收入国家中很突出,甚至超过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低重心,这是我国教育结构的特点和优点”。的确,建国时,我们面对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烂摊子,全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产业工人只有300万人左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先后大力推进了“扫盲”和义务教育,这是完全正确的。正因为我国的基础教育普及的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才得以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当今时代,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是新的形势,要实现的是在下世纪中叶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因此,要不要加快技术和智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要不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是我们讨论教育结构时不能回避的问题。要看到,正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做得较好,所以我们又进一步提出了要将“重心”有所上移的任务。应该说今天已有了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天时”与“地利”,我们必须办好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国民教育网络,同时又要不失时机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质性需求和支持,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8. “控制发展”论者的基本依据及其研究方法的重大缺陷。

主张控制发展的基本依据是: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指标的增长率超过了经济发展指标的增长率。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即建国以来我国的确多数时期或多数年份,无论从绝对指标还是从相对指标来看,高等教育的增长都不低于经济的增长。但是,用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与经济发展指标的增长率的对比来讨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与规模究竟是超前还是滞后,不仅在方法上经不起推敲,更不能经受数据与事实的检验。

首先,我国高等教育指标的基数小(如高校毕业生拥有量总数占全部人口的比重1952年仅为0.45%,

1994年也只是12.5%),正像发展中国家由于基数小,经济增长率正常情况下一般要比发达国家高一样,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虽是事实,但以此来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严重超前,理由并不充分。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就世界范围来看,尽管从短期看,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指标会有波动,但就长期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有或快或慢的增长。这显然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时代在前进,人类社会必然要进步,人类文明也必然在提高。我们对136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年份的数据进行核查的结果表明,1980~1993(1994)年,除立陶宛、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古巴、蒙古、几内亚等9个国家和地区毛入学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爱沙尼亚、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拉脱维亚、墨西哥、埃塞俄比亚、埃及、乍得、刚果、菲律宾、老挝等31个国家和地区毛入学率10多年来基本未变(可以看出,这其中大多数是由于政治、经济发生了某些特殊情况导致的结果);其余96个国家和地区毛入学率都有不同幅度的提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96个国家和地区当中,至少有46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有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同期人均GNP年均增长率的数据,所以只有约半数左右的国家)的毛入学率的增长率都不低于人均GNP的增长率,其中不仅包括美国、英国、新西兰、西班牙、葡萄牙、挪威、荷兰、法国、加拿大、丹麦、香港等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包括近些年刚刚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韩国、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毛里求斯、摩洛哥、突尼斯、哥斯达黎加、智利、以色列、保加利亚等发展中国家,其中有些国家毛入学率超过经济增长的幅度甚至并不亚于同期的中国。这些事实表明,“控制发展”论者依据高等教育发展指标的增长超过经济发展指标的增长得出的“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严重超前”这一命题,在研究方法上显然也存在重大缺陷。

显然,用高教发展指标与经济发展指标的增长率的对比来讨论我国高教发展速度与规模究竟是超前还是滞后,实际上陷入了思维的误区,并使一些论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有的学者对有的国家在一定时期经济是负增长,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却是正增长大惑不解;有的甚至在承认“事实上,经济水平相差悬殊的国家之间,高校的入学水平是不能相比的”的同时,又引证在方法上犯了同样错误的论据,说些什么“经济水平相同的国家间,不同的高教规模看不出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我们不禁要向控制发展论者提出这样的诘难:既然不同的高教规模看不出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尽管这是在经济水平相同的国家之间),那么,为什么经济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高教发展水平又是如此地悬殊呢?

客观地说,控制发展论者之所以陷入怪圈,在毛入学率与经济增长率进行对比的迷宫中绕来绕去,找不到出口,根源在于他们至今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由经济发展的计划增长率来决定其它指标增长率之思维习惯。这在当时极为正常,人们因而熟视无睹。其实,这种思维模式有一个先验的未加证明的前提,即认为历史上因袭下来的比例关系是大体上合理的。而事实恰恰是常常出现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

一个显然的结论是:反映高教发展水平的指标的增长率与表征经济周期景气循环的经济发展指标的增长率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说有联系,也只能是派生的、间接的联系。高教发展水平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因素不是经济增长率,而是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及其所决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尽管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受到人们特别是决策者观念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但这只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相对的;而长期的、无条件的、绝对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只能是那些客观的结构的经济因素。认为高教发展指标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指标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某种“线性的”或者“非线性的”“相关”关系,事实上只是“想当然耳”!即使是真能找到高等教育发展指标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指标

增长率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某种相关关系,也绝不等于因果关系!

所以,高教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关系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其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显著不同;而经济水平相同或相近的国家间高教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只能在产业结构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中去寻找答案。正因为产业结构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的不断演进,才推动着高教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决定高教发展水平的经济依据不是经济增长率,而是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及其所决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

我国 1996 年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仅为 2.8%^[6],这仅为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平均百分比(13.6%)的 1/5! 乡镇企业的这一比例更低,只有 1.3%^[7]! 专门人才的严重短缺难道还不是事实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国经济跨世纪发展要实现的是在下世纪中叶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一目标,但按照“控制发展”论者的思维逻辑(即经济每增长 3%,毛入学率或每 10 万人口的大学在校生人数相应增长 2%)及其提出的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设想^[8],甚而到 2050 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才达到 30%(UNESCO 口径 25%)左右! 也就是说,50 多年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才只相当于下中等收入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水平。我们要在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究竟是靠什么?

9. 调整政策,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

按照国家教委公布的计划^[9],2000 年我国每 10 万人口中的大学在校生人数将为 500 人,毛入学率将为 8%(UNESCO 口径 6.4%)左右。我们发现,根据最新公布的数字计算,1997 年我国每 10 万人口中的大学在校生人数为 492 人,毛入学率为 8.1%(UNESCO 口径 6.5%),这意味着国家教委已对原定计划有所调整。但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微调还远远不够,因为我国经济正处在由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国家过渡的转型期。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到 2010 年,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在 2000 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这意味着我国将在今后约 15 年左右的时间由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下中等收入国家。这就要求到 2010 年或稍后一些,我国受过高等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体上由目前的 2%提高到 8%~9%,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的“增量”指标必须有大幅度的调整。此外,还要看到,当今世界正在大力发展知识经济,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充分考虑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因此,我们建议,采取迅速发展、分步提高的方式,逐步实现下述战略目标:

第一步,自 1999 年起,进一步增加高等学校尤其是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人数,并逐年提高,力争用 5 年的时间,即到 2003 年,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 18%(UNESCO 口径 14%)左右,在 1998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其年均增长不低于 14%;

第二步,到 2005 年,将毛入学率提高到 22%(UNESCO 口径 18%),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水平,亦即年均增长 11%左右;

第三步,在此基础上,再用 5 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即到 2010 年或稍后,将毛入学率提高到 34%(UNESCO 口径 27%)以上,达到乃至超过下中等收入国家中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平均水平,亦即年均增长 9%或略低。

提出这样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呢? 这里已无须再引证不少学者已反复引述的例子(如韩国、新加坡等)来论证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都伴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单从我国近几年的数据看,也是仅用 5 年的时间,1996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比 1991 年翻了一番。我们提出的迅速发展、分步提高的建议,经过努力也同样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20 世纪以来,我国有许多仁人志士,都追求过一个伟大的理想——科学救国。在封建的、买办的、官僚

资本主义的统治下,这样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是不是还应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呢? 十分令人欣慰的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论,那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既为“科学救国论”恢复了名誉,又使得人们得以将“科学救国论”放在科学的地位上,所以在 1995 年,我国正式提出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最近,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郑重表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政府有决心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我们为此欢欣鼓舞,倍感亲切。100 年就要过去了,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调整政策,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实现四个现代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鸣谢:本文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图书馆李跃进先生,国家教委周贝隆、戴荣光、薛浣白同志的大力帮助;庆承瑞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了讨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能够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事务之余仅用 3 个月时间完稿,得益于赵燕红、光大资产评估公司陈晓萌女士协助对大量数据和部分文字的整理、录入和校对。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 [1]周贝隆:“高教发展规模的战略选择”,《高等教育研究》1996(2);“数据、分析、战略判断和选择——关于高教发展问题的札记”,《科技导报》,1993(3);“证伪、求实——再谈高教发展数据的国际比较”,《科技导报》,1996(9);“高瞻远瞩,及早筹划,迎接挑战——关于制定 2010 年教育规划的思考”,《科技导报》,1995(10)。
- [2]:中国 21 世纪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访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朱开轩,《中国 21 世纪经济走向——部省级领导干部访谈录》,邢俊芳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年 9 月第 1 版,P350~366。
- [3]按 UNESCO 口径,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计算应以大学在校生数为分子,以 18~22 岁(由于中小学学制长短等不同,个别国家是 17~21 岁或 19~23 岁,但都是 5 年的年龄段)年龄段人口作为适龄人口为分母来计算,但《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给出的毛入学率是按 18~21 岁(4 年的年龄段)的人口数为分母计算的(周贝隆先生也这样主张,其理由是由中国的学制大专 2~3 年,本科大都 4 年。据我们了解,其它国家也大都如此),但是我们按毛入学率与在校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间的换算关系计算,检验的结果表明:用此方法计算出的 1995 年我国 18~21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4.6%)与按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得到的结果(5.9%)严重不符;按 5 年即 18~22 岁计算的结果(7.1%)则与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得到的结果(7.6%)接近。因此,以 18~21 岁为口径计算毛入学率,实际上是在缩小分母的同时没有也无法相应地缩小分子。鉴于这一事实,再考虑到按 UNESCO 口径,大学在校生数应包括成人高校在校生数,而我国成人高校在校生数已接近普通高校,故我们主张仍应以 UNESCO 的口径为准。
- [4]实际上,只要毛入学率的口径相同,用这两个指标中的任何一个说明问题都是可以的,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是:毛入学率=在校学生数/适龄人口=在校学生数÷总人口/适龄人口÷总人口=在校学生占人口比例/适龄人口占人口比例。

这里需要指出,我们对《中国统计年鉴(1997)》和《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6)》给出的 1996 年相关数据进行了核实、计算,发现《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每万人口的大学在校生数是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为分子计算的,没有包括研究生数,也没有包括成人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如果以此与 UNESCO 口径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中国的数据会大大偏低。

- [5]孔宪铎,“对教育的呼声”,《科技导报》,1995(4),P38
- [6]《中国统计年鉴(1997)》
- [7]吴永亮,“人才匮乏——跨世纪的挑战”,《经济日报》,1998 年 1 月 25 日第 7 版
- [8]参见注 1 与注 2 有关文献
- [9]参见注 2 有关文献

(责任编辑 蔡德诚)